

中国历史上对南海诸岛的管辖

□ 李国强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确立了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已经开始了在海上的航行活动。最晚到东汉，我国古人对南海中的礁屿和浅滩就有了命名即“涨海崎头”。古人所讲的“涨海”，就是对南海最早的称谓，“崎头”指南海岛礁。

唐代对海南岛以南广大海域和岛礁实施了管辖。韩愈在《昌黎先生集》中记载，岭南节度使的管辖范围“多洲岛”。宋代延续唐代建制，南海诸岛属于广南西路琼管吉阳军管辖范围。宋太祖在971年平定南汉刘侔后，建立了巡海水师，负责巡管南海海面。由宋仁宗“御序”、集贤校理曾公亮撰著的《武经总要》中记载水师巡视所到达的“九乳罗洲”即今西沙群岛。此外，宋代文献中频繁提及的“石塘”“七洲洋”“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等称谓，均是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命名，进一步表明南海诸岛不仅是国家疆域的一部分，而且纳入了国家治理范畴。

至元代，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测量全国疆域，派太史令郭守敬进行“四海测验”。经过精心策划，郭守敬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的广大地区，设置了27个天文观测站，其中最南端的测量点即为中沙群岛的黄岩岛。此外，元代也设立巡海水师，负责巡视南海海面，维护海疆安全。由此，元代中央政府在行政和军事两个方面都加大了对南海诸岛行使管辖权的力度。

明代在海南置琼州府，并设立巡海备倭官和海南卫，其中海南卫“统兵万余”，巡逻“海道几万里”，远涉南海各岛礁。1621年茅元仪所著《武备志》中有著名的《郑和航海图》，该图在广东南澳岛至海南南面航道外，标绘有无数沙状和石块

的“石星石塘”、成礁石状的“石塘”和“万生石塘屿”，便是今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该图进一步明确了南海诸岛归属于广东省的行政隶属关系。

清朝沿袭明制，设立崖州协水师营，巡护范围“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清代水师在执行巡海防务的同时，还负责朝贡护送、海难救助等任务。同时，清政府通过海图绘制、渔民管理、岛屿巡查等多种方式，不断巩固对南海诸岛的管辖。雍正《广东通志》记载：“琼以海为界……州治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烟波隐见”，确认南海诸岛为琼州所辖，并强调其作为海疆界线的重要性。嘉庆年间绘制的地图，如《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不仅将长沙海、石塘海明确在我国版图之内，而且把“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作为山川单位列入广东省琼州府辖下的万州管辖范围内。光绪、宣统年间的地图文献，将南海诸岛作为我国领土和海防险地予以标注，如《琼州府志》的海防记录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列为琼州府万州辖下的山川单位，并指出其为“琼洋最险之处”。

时至近代，面对西方列强对南海诸岛渔业、矿产资源的疯狂掠夺，晚清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维权行动。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非法侵入东沙岛，盗采我国矿产和渔业资源。清政府立即进行对日交涉，日本人不得不撤出东沙岛。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及林国祥、吴敬荣等率队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舰查勘西沙群岛。李准登临西沙岛礁，立碑志记，升黄龙旗，宣示主权。在勘探过程中，李准等人查明西沙群岛有岛屿15座，逐一命名勒石，悬旗鸣炮，宣告中外。在李准巡视之后，广东省政府成立了“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处”，制定了复勘西沙群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对开发、建设、保卫

西沙群岛做出详密计划。1910年，清政府制定在东沙岛《招募渔人试办渔业章程》，对中国渔民前往东沙岛进行渔业生产的有关事项，如人员组成、所需办理的手续、资金费用和税收、所获海产的验收统计、渔民在岛上的生活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这一章程的颁布，表明清政府对南海诸岛开发和经营有组织管理的持续加强。

民国期间，中央政府就维护南海诸岛主权问题，同西方列强开展了一系列维权行动。1933年，法国侵占我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制造了“九小岛事件”。国民政府向法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我国各地各界群起抗议，纷纷谴责法国的侵略行径。1933年7月2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电法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南沙群岛“仅有我渔人居留岛上，在国际间确认中国领土”。8月4日向法国驻华公使提出对法国所谓主权宣告保留权利的外交照会。不久，国民政府外交部再次向法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谴责法国侵占南沙群岛的无理行为。8月间广东省政府也“奉命向法当局提出抗议”。1935年4月，国民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这是国民政府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具有官方性质的南海专项地图，图中较为详细地绘出南海诸岛各岛屿名称，并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在处于北纬4度的曾母滩。

二战期间，日本为推行南进战略，于1939年3月占领南沙群岛并擅自更名为“新南群岛”，随后台湾总督府发布第31号令，将南沙群岛编入台湾高雄州。二战期间，由同盟国签署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占领之一切岛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必须归还中国。据此，1946年9月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训令。中国军队先后在1946年11月和12月完成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任

务，并立碑鸣炮宣示主权，测量绘图明确疆界，留兵戍守实施巡防。1947年2月28日国民政府发布完成西沙、中沙、南沙群岛接收的公报。3月国民政府在太平岛设立南沙群岛管理处，隶属广东省，并建立气象台和电台。6月国民政府决定设立海南特别行政区，负责管理西沙、南沙群岛。同时，国民政府组织编写《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审定编制《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公布了172个南海地名，绘制了标有南海断续线的《南海诸岛位置图》。1948年2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其中包括《南海诸岛位置图》。1949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该条例第1条即规定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岛及其他附属岛屿均隶属海南特区管辖。

上述史实清晰表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在南海采取的官方命名、航路开辟、渔业活动、军事巡视等诸多行为，构成中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实施有效管辖和和平利用的完整证据链。中国不仅拥有南海诸岛主权，而且充分享有南海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来自于2000多年中国人民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持续的生产生活实践、来自于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连续的主权管辖权实践。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主权和相关权利的历史事实是确凿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历史依据是充分的、历史地位是合法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英国汉学家弗莱彻：让唐诗走向英语世界

□ 严晓江

弗莱彻（W. J. B. Fletcher, 1879—1933年）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也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官，在中国工作并生活了20余年，积极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尤其在唐诗译介和传播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的代表译作《英译唐诗选集》以及《英译唐诗选续集》于1918年和1919年出版，堪称唐诗走向英语世界的里程碑。

喜爱唐诗，认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弗莱彻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唐诗情有独钟。20世纪初，弗莱彻选择翻译唐诗不仅体现了个人喜好，更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理解和认同。唐诗是古诗的顶峰，也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明珠，渗透着尊祖先、重人伦、崇道德、尚礼仪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念，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弗莱彻的唐诗译介与研究工作密不可分，这是选择具体翻译方法的前提条件。他不仅谙熟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习俗、主流诗学，而且了解诗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旨趣以及诗歌的创作背景、主旨要义，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达意传情，实现古今对话、中西对话。

研究唐诗，挖掘中西文化的相通之处。翻译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弗莱彻的唐诗译介与研究工作密不可分，这是选择具体翻译方法的前提条件。他不仅谙熟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习俗、主流诗学，而且了解诗人的精神气质、审美旨趣以及诗歌的创作背景、主旨要义，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达意传情，实现古今对话、中西对话。弗莱彻善于发现中西文化的共情与共识，以等效翻译达到心灵共鸣。离别与乡愁是超越时空的普遍情感。李白的《送友人》富含浓浓的离情别意，颇似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忧郁”。“孤蓬万里征”，弥漫着前路漫漫、孤寂无依的惆怅与迷茫。诗人托物寄情，“孤蓬”是一种植物，干枯后随风飘零，一起起落落，喻指漂泊不定的远行游子，该词与农耕文明的语境有关。译者览物知情，巧妙运用替代法，译为“lone sail”，意思是“孤帆”。虽然字面意思不对等，但西方人很熟悉，符合海洋文明的语境。“孤帆”在隐喻层面接近“孤蓬”，

传递了漂泊感和寂寥感。可见，弗莱彻领会“心物合一”的创作特点，同时兼顾西方人的生存环境，挑选具有相似表现力的英语词汇，使他们产生相关联想，起到沟通中西文化、感动人心的作用。

汉英语言表达在虚实关系方面有很大差异，弗莱彻翻译时通过对诗人情感和诗文内涵的透彻理解，化模糊为清晰，使感性活动明朗化。杜甫的《春望》以“家书抵万金”突出了兵荒马乱之中的强烈思亲之情。“万金”是夸张说法，并不是指实际的等价数额，而是强调家书对传递信息以及维系亲情的重要分量。战争造成了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封家书极其珍贵，其特殊价值甚至胜过“万金”，由此道出了处在战火阴霾之下民众的心声。在一般情况下，古诗中的数字是虚指，英语诗歌中的数字是实指。弗莱彻注意到这种区别，没有将“万”用实指性数字译出，而是以“costs a fortune to bring”加以明示，说明烽火连绵中一封温暖的家书仿佛是从天而降的幸运之神，这种美妙联想和绵绵情思令人动容。

译介唐诗，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弗莱彻翻译唐诗，不仅仅停留在语言转换层面，更重要的是尽量通过异化翻译再现唐诗的中国味，激发西方大众读者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同时给英语诗歌带来某些新意，达到“译”与“介”的双重目的和效果。

唐诗的意象并置手法是重要特色，也是古典诗词的亮点，体现了中国古人“以物观物”的视点。弗莱彻十分欣赏这种直观、简洁的表达方式，让景物在直文中得以自然地呈现。意象并置在英语诗歌中并不常见，西方译者的效仿从一个侧

面折射出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汉语行文注重意会，很少使用介词和连接词，结构简约而紧凑。李商隐的《无题》营造了一个繁星点点、微风习习的温馨氛围：“昨夜星辰昨夜风。”诗人以“星辰”与“风”铺开一幅唯美画面，叠词“昨夜”具有一种唱叹抒情的音美效果，加深了追忆往事的基调。弗莱彻翻译时以名词词组或介词词组将意象并置，既沿袭了原文句式，又符合英语造句的名词化倾向，体现出画面感和简洁性：“Oh, ay! The stars of yesternight!” “Oh, yesternight wind!” 中国人讲究温柔敦厚，西方人喜欢直抒胸臆。感叹词“oh, ay”契合英语诗歌偏向直白的诗学规范。在翻译与中国传统节俗文化相关的诗句时，弗莱彻也重视把握其独特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挖掘并传播其中深厚的人文内涵和情感意义。

弗莱彻的唐诗译介是“中学西传”的重要标志之一。他用英语的格律体诗歌形式重构中国经典，赋予译诗形神兼备之美。虽然某些地方还有待商榷，但体现出这位西方汉学家在折通中西、勾连古今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and 探索。弗莱彻通俗易懂、简洁雅致的翻译风格具有借鉴意义，不仅丰富了英语诗歌的创作传统，同时有效提升了唐诗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著名学者顾钧在弗莱彻《英译唐诗精选》这部精华本中的序言中这样评价：“弗莱彻的唐诗译文简洁、直率、典雅。虽已历经百年，但仍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连续营建直至清代，是由崖面遗迹（包括洞窟及其造像、壁画、摩崖题刻等）、寺院、舍利塔等建筑及馆藏文物、古代文书等组成的综合体文化遗产，现存洞窟221个，各类造像3938件，壁画近千平方米，素有“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美誉，蕴含着丰富且重要的历史、文化、民族、艺术、科学等价值，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拥有厚重历史和独有特征的麦积山石窟，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具体而微的典型代表和生动展示。

千年营造、延续不断，彰显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南宋地理类著作《方輿胜览》记载：“麦积山，后秦姚兴凿山而修，千崖万像，转崖为阁，乃秦州胜景。”明崇祯十五年《麦积山开除常住地粮碑》记载：“（麦积山）其古迹系历代敕建者，有碑碣可考，自姚秦至今一千三百余年，香火不绝。”麦积山石窟东崖第3窟和第4窟之间崖面上原有南宋绍兴二年题记：“麦积山胜迹，始建于（姚）秦，成于元魏。”通过对麦积山早期的第74、78等窟最新的碳十四测定结果显示，这批洞窟的最初开凿年代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十六国后秦时期，其后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朝代1400多年连续不断的营建，成为中国石窟寺中开凿和营建历史最长的石窟，是中国石窟寺中开凿历史序列最为完整的石窟寺，在世界石窟营建史中也是独一无二。麦积山石窟漫长而又未曾中断的修建史，恰恰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有力印证。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彰显中华文明的创新性。麦积山石窟将来自域外的佛教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的融合发展，造就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随着佛教的传入，开始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入中国，先后有了著名的克孜尔石窟、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麦积山石窟等早期重要石窟的开凿，形成了贯通东西的中国石窟走廊，之后才有了大量石窟在中国大地的遍地开花。与佛教在中土传播中国化相对应，石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是逐渐完成了石窟中国化，处于中国石窟分布区域十字路口的麦积山石窟，就是中国石窟发展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

天水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秦安大地湾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来源之一，以人头像彩陶瓶和鱼纹盆为代表的彩陶文化，展示了先民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具有较高的审美及艺术追求，以及对于塑形和线条艺术的掌握和表达能力，而这恰恰是石窟艺术中塑像和壁画两大内容最基础的艺术基础。中西合璧且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麦积山石窟，显示出泥塑和壁画艺术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同时也揭示了麦积山石窟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本土天水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技术工艺为体，对外来的佛教艺术进行创新性转化和表达的结果。

融汇四方、终得大成，彰显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1400多年的营建历史中，除去大一统王朝时期的统一有序营建，即使在纷乱割据的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麦积山石窟的艺术风格，也是与当时平城、长安、洛阳等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保持了统一性，和其他大型石窟寺美美与共、各美其美，共同追求和构建着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

后秦时期，麦积山石窟受到长安地区 and “河西旧风”的影响，将传自犍陀罗地区的佛教造像特征进行吸收，开凿了麦积山石窟第74、78等早期洞窟。北魏时期，先后受到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影响，形成了与当时北中国风格较为统一的造像风格。西魏时期，麦积山出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造像，一种是延续北魏晚期的造像风格，一种是受洛阳地区佛教艺术影响，特别是以永宁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的影响，造就了以第44、20、123窟等为代表的经典洞窟。第127、135等窟所绘制的大型壁画，代表了当时北中国壁画艺术的最高水平。北周时期，麦积山先后受到了北齐境内郛城等地以及四川地区佛教艺术的影响，麦积山第120窟窟顶重绘的北周壁画，就是对这一历史的说明。

麦积山石窟虽然区域性特征明显，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了南北方多处中心文化的影响，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构成了中国石窟寺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一环，是国内唯一将河西、长安、云冈、洛阳、成都五个区域石窟造像风格兼容并蓄的石窟，映照着中华文明统一性这个突出特性。

民族融合、多元一体，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天水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区，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麦积山石窟是公元5—18世纪佛教沿丝绸之路传播和发展的典型佛教石窟寺，也是中国石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具体而微的代表

□ 张铭

窟寺发展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麦积山石窟在1400多年的营建历史中，各民族文化得以融合、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互鉴。从早期较为生硬的“你之造像，我之建筑”的“混搭”，逐步转化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文化融合，造就了麦积山石窟多民族共建的千年发展和营造历史，彰显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特征，凸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北魏、西魏、北周皆是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一阶段麦积山的窟龕内，胡汉交融并存的情形比比皆是，不管是造像特征还是服饰穿着，同时出现在一个洞窟内，毫不违和，且自然融洽。西魏时期，麦积山石窟在当时崇尚清淡的社会背景下，创作出诸如第123窟维摩诘像在内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造像组合。北周时期提倡恢复周礼，麦积山石窟将佛教的七佛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凿了第4窟这样的建筑奇观。元代麦积山迎来了藏传佛教的短暂发展，有少量的造像遗存，麦积山第48窟内的四臂观音造像反映出藏传佛教在北方地区的盛行以及元代北方多民族佛教信仰的互动与融合。而第78窟出土壁画中的隋代伎乐飞天所持琵琶，则是波斯传来乐器经过中原改造后的最新模样。

祈愿太平、关照大千，彰显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作为北方禅修圣地的麦积山石窟，在其开凿之初，就与有着秦地林泉之冠美誉的麦积山和周边环境达到相得益彰的搭配，构成天人合一的“麦积奇观”，成为中国石窟中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的最佳组合，显示出中华民族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选择，以及追求自我圆满和自我观照的平和与升华。

麦积山石窟第44窟“东方微笑”主佛沟通彼此直达内心的慈悲恬淡，第133窟一笑千年初心不改的东方小僧，第121窟“窃窃私语”造像闻法欢喜却又张弛有度的自我约束，第133窟释迦会子时的父爱如山，还有阅遍大千而自得大度、自然洒脱的维摩诘造像。宋代重修第13窟时放进的护国三经之一的《金光明经》，是对国家安宁的美好祝愿。北周第4窟上方白灰涂写的太平大字，则是开窟造像对国家和民族前景的最朴素感情。对于天下太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贯穿这座千年石窟的每个阶段。这些真实虔诚、饱满丰富、自然平和的表达，正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写照。

（作者系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馆员）



从考古看文明